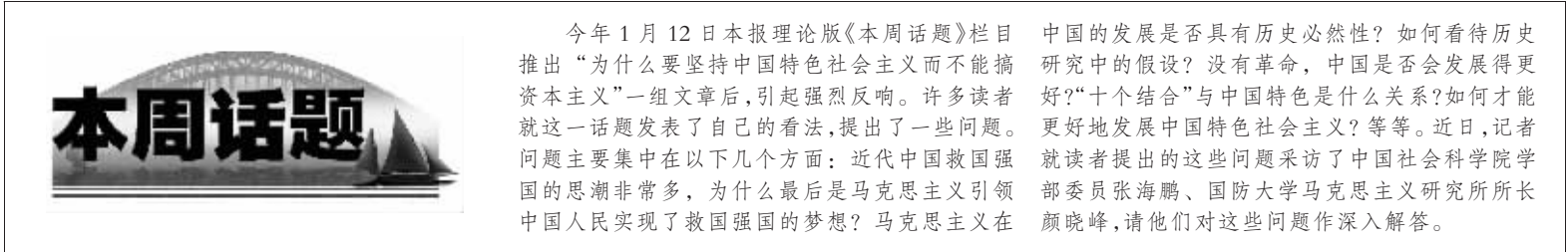


“六个为什么”系列解答（2）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

本报记者 叶帆 朱佩娟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是历史的必然

问:在近代中国,救国强国的思潮非常多,为什么最后是马克思主义引领中国人民实现了救国强国的梦想?

张海鹏:这个问题提得很好。的确,在近代中国,各种救国思潮很多。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实业救国、道德救国等等,在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实业家那里是十分笃信的;自由主义、实用主义等等,在知识分子中也有一定市场;君主立宪、共和制度,也经过长期的辩论。国家主义、好人政府、联省自治、乡村建设等各种政治主张,有人提出,有人实践,但很快就烟消云散。最重要的思潮或者主义是两种:三民主义,社会主义。这两种思潮的传播和实施,都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

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在 20 世纪初的国际国内情势下提出来的政治思想主张,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纲领。这种主张或者纲领在 1924 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经过孙中山的重新阐述,反映了当时国共合作反对北洋军阀的要求。基本上说,反映孙中山社会改造思想的是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思想。民生主义思想首先来自 19 世纪末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启发,在一定意义上还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又结合了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孙中山在阐述他的三民主义理论时,内心中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的好感。孙中山去世后,随着中国国民党的分裂,三民主义思想也被不同的政治家所篡改。篡改后的“三民主义”违背了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学说,反对并屠杀共产党,镇压工农运动。国民党、蒋介石脱离人民群众的利益,违背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方向,终于在决定中国历史命运的大决战中彻底败北。三民主义不能救中国,就在这样的大决战中被证实了。能够救中国的只能是经过大决战检验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新民主主义理论明确规定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是经过历史实践检验过的。

问: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有历史必然性吗?

今年 1 月 12 日本报理论版《本周话题》栏目推出“为什么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能搞资本主义”一组文章后,引起强烈反响。许多读者就这一话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提出了一些问题。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近代中国救国强国的思潮非常多,为什么最后是马克思主义引领中国人民实现了救国强国的梦想?马克思主义在

张海鹏:我的回答是肯定的。第一,马克思主义的出现不是个别现象,不是偶然现象,也不是可有可无的现象。马克思主义是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换句话说,它是资本主义成熟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工人运动成熟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第二,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推动了欧洲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还随着资本主义的世界化在世界范围内传播。

第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迟早都要发生的。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还在清朝的最后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观点已经出现在中文刊物和著述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作为战胜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失败,大大刺激了中国知识分子和仁人志士的思考;加上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成果推动,中国人进一步思考从晚清到民国初年中国的历史发展道路,更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这就是说,五四运动后或者说中国共产成立后,中国人考虑国家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已经成为历史的趋势。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必然性。这个历史必然性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建立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上的,是建立在由于帝国主义侵略造成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力量弱小、资产阶级政党力量弱小的基础上的。而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这个政党的理论终于掌握了人民大众,掌握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大方向。

颜晓峰: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曾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作过精辟的阐述。1840 年鸦片战争的失败,充分暴露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腐朽没落,也充分促进了民族先进分子救亡图存的觉醒。中国封建文化不能成为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的思想武器,于是就转向西方寻求强国崛起之道,形成了西方各种思潮纷纷涌入的局面。经过历史检验,这样那样的学说和观点都碰壁了、破灭了,因为它们都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落后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来考察国家发展之道,应用于中国,就是只有人民起来革命,推翻三座大山的统治,建立社会主义所有制和人民民主国家政权,才能解决人民解放、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问题。可以说,

中国的发展是否具有历史必然性?如何看待历史研究中的假设?没有革命,中国是否会发展得更好?“十个结合”与中国特色是什么关系?如何才能更好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等。近日,记者就读者提出的这些问题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海鹏、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颜晓峰,请他们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解答。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回答和解决近代中国主要矛盾的正确理论,毛泽东等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先进分子与马克思主义的汇合是历史的必然。

历史是不能随意假设的

问:有人认为,假设中国当初不走社会主义道路而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现在或许发展得更好。请问专家,应该如何看待这种假设?

张海鹏:首先必须指出,后人对历史发展过程所做的随意假设是没有意义的。如果允许这种假设,人类对历史的认识将变得毫无意义。以前就有人说过,中国如果当上 300 年殖民地,早就现代化了。这样的说法如同梦呓。说者至少是出于对近代中国国情的无知,也是对现代中国国情的无知。假设中国当初不走社会主义道路而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暂且认为这样的假设有某种意义,中国是否会发展得更好呢?我看不也尽然。这个问题,我们不能从中国发展道路的历史事实中来求证,因为中国发展道路不是这样的。我们可以看看地球上类似国家的状况。

首先看日本。日本在 140 多年前实行明治维新,走了“脱亚入欧”的发展路线,是继欧美国家后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可是日本却是一个靠军国主义、靠战争、靠掠夺发展资本主义的国家。中国和亚洲国家吃它的苦,还需要在这里细数吗?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美军占领日本后,如果不是出于冷战需要,扶植日本作为对抗社会主义阵营的基地,日本的战后发展还不知道怎么样呢。

再看印度。印度早于中国差不多 200 年成为殖民地,其独立时间和中国差不多。印度是一个大国,是按照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国家,今天被称为“金砖四国”之一。这 60 年来,印度的发展状况和人民的富裕程度,是不是比中国更好呢?这是一个不难回答的问题。

再看俄罗斯。俄罗斯是最先建成社会主义的国家,搞社会主义搞了 70 来年,1991 年选择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俄罗斯搞社会主义的时候,军事、经济实力均可抗衡美国,而今天的俄罗斯在综合实力上与美国却是相差甚远。

亚洲的菲律宾、缅甸、泰国、印度尼西亚以

及拉丁美洲、非洲大陆等许多国家,走的都是资本主义道路,今天的情况如何,恐怕不需要多加引证了。

环顾世界各国,相比较之下,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对国家的整体发展,对人民生活改善,对综合国力的提升,对国际地位的提高,是不是更好些呢?如果中国当初不走社会主义道路而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种假设可以成立的话,我们也不难想象,在列强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压榨下,在内部四分五裂下,发展状况还会好吗?

问:中国是通过革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进而走上现代化道路的。有人认为,近代中国如果没有革命,也许会发展得更好。应该如何看待这种观点?革命与社会主义以及现代化之间是什么关系?

张海鹏:说到革命和现代化的关系,是可以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作出合理解释的。一般来说,旧日的社会制度严重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时候,就有可能发生革命,以扫除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而这样的障碍一旦扫除,社会就会获得大的发展。18 世纪的法国大革命,起到了推动法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作用;美国在 18 世纪发动北美独立战争,取得了国家独立,才使生产力获得解放,进而在 19 世纪末以后发展成为世界强国。中国则是在取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获得国家独立之后,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

有人认为近代中国如果没有革命也许会发展得更好,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10 多年前,有人发表“告别革命”的说法,就提出了这种观点。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不能成立的。首先,这是一种随意的假设,假设者提不出任何有价值的证明。换句话说,你用什么材料来证明你的观点?历史不能重来来过一次,否则还可以检验一下你的观点是否有可行性。其次,任何社会的革命都不是人为制造出来的,而是客观环境逼迫出来的。有一句话说,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人民大众不能照旧生活下去的时候,革命就可能发生。这时候,革命党振臂一挥,人民就会跟从,革命就会大规模地开展起来。如果没有这样的客观环境,任何人、任何政党凭空呼唤革命,是制造不出革命来的。第三,近代中国从鸦片战争后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统治形态基本上是封建主义的。同时,帝国主义国家不断侵略,用战争、不平等条约等多种手段在相当程度上控制了中国的政府,操纵了中国经济。在这种政治和经济条件下,从晚清政府到民国政府都面临着不能照旧统治下去的局面,人民群众也不能照旧生活下去,因而革命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这是近代中国的基本历史事实。我们怎么能不顾这样的基本史实,而假设中国如果没有革命会发展得更好些呢?

我国经济发展的几个转变

陈宗胜 任重 周云波

改革开放 30 年来,我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这不仅体现在国民经济从濒于崩溃的边缘发展到总量跃居世界第三位,而且体现在经济发展出现一系列重大转变。研究分析这些重大转变,有利于明确未来经济发展的方向。

经济增长模式不断优化——从要素投入型增长逐渐转向效率改进型增长。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增长基本上是要素投入驱动的。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效率迅速提高。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90 年之前,初步显现出效率改进型经济增长的特征,效率改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 50%。带来效率提高的因素主要是二元结构转换,即劳动力从低效率农业部门向高效率工业部门转移。1990 年之后,效率改进型经济增长模式进一步形成,效率改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 77%。带来效率改进的因素除了二元结构转换和体制改革激励,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由研发投入增加以及技术吸收所导致的技术进步和净效率提高。未来,应当进一步增加研发投入,促进自主创新以及技术引进和吸

收;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确保劳动力顺畅转移到高效率部门。

产业结构逐步升级——初步实现从传统农业大国向现代工业大国转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结构转换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 1978 年至 1984 年,改革的中心在农村,属于农业蓬勃发展时期,特征为农业部门产值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非农业部门;第二阶段是从 1985 年至 1991 年,改革的中心转移到城市,国有企业改革、价格体制改革等改革措施出台,工业增长速度加快,同时农村乡镇企业进入蓬勃发展时期,极大地推动了工业化进程;第三阶段是从 1992 年至 1999 年,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外商投资企业和个体私营经济蓬勃发展,乡镇企业出现发展的第二次高潮,产业结构转换的速度加快;第四阶段是从 2000 年至今,我国经济进入平稳较快增长阶段,工业企业技术进步不断加快,信息化与工业化相互融合,高新技术产业、现代能源产业、基础产业、第三产业迅猛发展。经过 30 年的努力,我国初步从传统

更好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问:我们党提出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十个结合”的宝贵经验。是否可以认为,“十个结合”就是中国特色?

颜晓峰:从方法论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关键在于“结合”。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贯穿始终的一条基本经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也使这一结合进入新的阶段。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得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具有了新的内容和形式。正是在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我们党紧紧围绕改革开放进程中的新矛盾新问题,探索结合的新对象新内涵,逐步形成和发展出“十个结合”的宝贵经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法论的精髓是“结合”,这是由我国国情和历史发展的状况决定的。在中国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但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能照搬本本。因此,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人类文明优秀成果与中国国情有机结合起来。表现在政治原则上,就是既不能僵化也不能西化,既不能“左”也不能右;表现在实践关系中,就是这种结合是统筹协调、把握平衡的结合。

结合是不同方面、不同要素、不同取向的结合,是整合优势、产生新质的结合。这种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创造。一些原以为绝对对立的事物有效结合起来了,发挥了极大效能,如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一些原以为顾此失彼、替代选择的价值在结合中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如效率与公平的结合。

“十个结合”的宝贵经验,扎根于当代中国的实践土壤,同时又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是反映这三条规律的综合成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就是遵循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寻找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得以实现的特殊形式和特殊途径。

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功,但任何一种发展道路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缺、一成不变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否需要借鉴资本主义的一些做法?如果要借鉴,应该借鉴一些什么东西?这个度如何把握?

颜晓峰: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关键看其是否适合本国国情,是否促进社会发展,是否得到人民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当代中国发展唯一正确的道路。当然,当今世界,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封闭发展,都要在和外部世界的交往中、在学习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包括社会主义的有益成果中得到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对资本主义为人类文明作出的历史性创造给予高度评价,同时也对资本主义带来的罪恶和社会不公进行了严厉批判。借鉴什么,就是要以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为标准,解放思想、为我所用,学习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包括一些思想理念和具体制度。必须指出的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两种不同的制度体系和价值体系,在交往、借鉴中不能没有原则。一是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违背四项基本原则就要动摇社会主义的基础;二是要适合中国国情,不符合中国国情只能在实践中导致失败。

官为什么不好当了

朱文鸿

最近与几位担任领导职务的朋友聚会,谈到为官从政的体会和感受时,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就是现在的官不好当了。这种看法也得到了一则消息的印证。据报载,山西省一位县级领导干部坦言:当官已经成为一种“在鸡蛋上跳舞”的高危行业,那种当太平官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当官成为高危行业的说法也许有些夸大其词,但现在的官不好当了却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为什么官不好当了?

官不好当了,是因为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和艰巨的改革发展任务对领导干部的素质能力要求越来越高。从国际形势来说,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继续深入发展,科技革命加速推进,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同时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我们既面临重要战略机遇期,也面临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占优势的压力,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我国的战略图谋从没有改变。从国内形势来说,经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新事物、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同时改革发展进入关键阶段,一系列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日益凸显,协调各种利益关系的难度不断加大。在这种形势下,如何跟上时代潮流,提高素质能力,以更好地履职尽责,推进改革发展稳定,是对领导干部的重大考验。

官不好当了,也因为人民群众对领导干部的希望和期待越来越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人民生活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富裕起来的人们在基本生存需要得到满足的同时,进一步提出了丰富精神文化生活、扩大政治参与、实现全面发展等新的更高的要求。这实际上也就是对作为决策者、组织者、管理者的领导干部提出了新的更高的期待。如果仍然停留于老观念、老做法、老套路,自然会出现捉襟见肘、无所适从的为难局面,人民群众也不会满意和答应。因此,领导干部要想不辱使命、不负重托,就必须奋发进取、有所作为。这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官不好当了,还因为针对领导干部的监督管理越来越严格。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这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原则。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我们党和国家的各项制度和法律法规不断健全完善,对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管理监督越来越严格规范、透明公开,也越来越要求领导干部做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同时,人民群众的权益意识、参与意识、监督意识明显增强,希望把公共权力的运行置于阳光之下。比如,近年来问责制度的实施以及互联网的发展,已经对领导干部形成了强大“压力”。这样一来,那些不务正业、忙于投机钻营的干部,那些心存侥幸、搞腐败的干部,那些随心所欲、不按规矩办事的干部,空间和市場无疑就越来越小了。

我们党一贯强调,领导就是服务,领导就是责任。职务越高,越要增强服务意识;权力越大,责任也就越大。这说明,当官本来就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一个简单好干的职业。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依然存在着“干好干坏一个样”、“干部能上不能下”、“出了问题易地为官”等不正常现象,使得部分领导干部产生了“只知有权,不知有责”、“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等思想,也使社会上一些人形成了“什么都不会干也可以当官”等观念。这实在是一种误解和错觉。从这个角度看,领导干部认识到“官不好当了”、“当太平官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是一件好事。它意味着领导干部感受到了压力和责任,必须不断学习新知识、积累新经验、掌握新本领,不断增强宗旨意识、服务意识、责任意识,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更好地干事创业、推动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 2009 年度工作会议”近日在北京举行。会议围绕巩固和加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深化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加强学风和作风建设等问题进行了交流。

与会者指出,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和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新变化新情况,需要更加自觉地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学术导向,采取有力措施,巩固和加强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不懈地抓好理论武装工作,提高广大党员干部和科研人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水平和能力;牢牢把握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的话语主导权,及时掌握思想理论动向和社会舆情动态,提高做好

着力提高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能力——“中国社会科学院 2009 年度工作会议”述要

本报记者 苏超

与会者强调,要进一步加强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力度,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有利于创新的管理体制机制。具体而言,就是要逐步建立符合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律、具有社科特色、有利于出精品成果的科研管理体制机制,符合人才成长规律、有利于人才成长、具有竞争激励作用的人才管理体制机制,有利于为科研和科研人员服务、有利于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走向世界的科研辅助管

理体制机制。与会者认为,加强学风和作风建设是做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条件。要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和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增强研究人员理论联系实际的意识和问题意识,不断提高及时准确捕捉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的能力;倡导严谨真实的治学态度,加强学术道德修养、遵守学术规范,反对弄虚作假、抄袭剽窃,抵制不良学术行为。



本版更多精彩,尽在人民网理论频道
http://theory.people.com.cn